

云南大学

中国 经济 史

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  
「富民」  
阶层研究

林文勋 等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大学 **中国** **经济** **史** 研究丛书

#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

林文勋 等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林文勋等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1112-281-7

I. 中… II. 林… III. 阶层—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5074 号

##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

林文勋 等著

---

责任编辑 冯 峨 蔡红华  
责任校对 严永欢  
封面设计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4.375  
字 数 374 千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12-281-7  
定 价 36.00 元

---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电话: 0871-5033244 邮编: 65009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 总序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外学者对经济史的具体界定还存有分歧和争议,但无论如何界定,经济史在本质上总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一门科学。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样的研究内容决定了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功用就在于总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经济发展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不言而喻,不进行经济史的研究,就不可能了解历史上各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的历史前提和既有条件。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无本之木,而是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这样,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就必须研究历史上各社会形态经济的发展。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经济学随着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形成和完善,反过来,经济史学科也在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经济史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基础,经济史成为了解剖现代社会经济并科学预见人类社会未来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实践,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供借鉴。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加强经济史的研究。

## 2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

究,认真总结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特点、规律、经验、教训,为当前及今后的经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经济发展从传统模式走向现代范型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传统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起点和基础,要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传统经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除大力开展经济史的研究外是别无它途的。这就使经济史的研究不仅显得十分必要,而且极为迫切。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史研究是关系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性战略工程。

1890年,七旬高龄的恩格斯在给二十多岁的德国青年康·施米特的信中勉励他要研究历史,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不仅如此,恩格斯还特别指出“经济史还在襁褓之中”,并深为不满地说:“在靠拢党的青年作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4—478页)恩格斯的这些要言,无异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应当以之为座右之铭,奉为圭臬。

回顾国际经济史学研究的发展,从恩格斯给康·施米特写那封信到现在,在国际范围内,经济史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情况已非过去所能相比。但是,在人类刚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新的世纪和新的发展仍然需要我们用新的理论对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的发展做出新的阐释。特别是就中国而言,面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需要和经济史学科发展的新趋势,站在新的世纪,用新的理论解释传统经济的发展,更加任重而道远。所以,大力开展经济史的研究,仍然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着较长的历史。从20世纪40年代李埏先生在云南大学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的教学和研究至今,已有六七十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虽然发展道路颇多艰辛和曲折,但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1982年12月,在李埏先生的倡导和直接领导下,云南大学成立了历史系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这是云南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成立的经济史专门性研究机构。建室伊始,李埏先生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一篇题为《我爱公孙树》的杂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将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比喻为一株公孙树,并满怀深情地写道:“在这样美好的时代里,我们这株小小的公孙树苗一定会欣欣向荣,茁壮成长的。”1986年,学校集合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和原经济系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力量共同组建中国经济史重点学科,旋即得到上级部门批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被确定为首批云南省级重点学科。这标志着云南大学的中国经济史学科又一次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李埏先生再次满怀深情地写道:“这件事,在云南大学校史上,是值得写上一笔的。假如容许我僭妄地借用恩格斯的上引话说,云南大学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这以前是在襁褓之中,那么,从此以后它已脱却襁褓,而开始学步了!当然,孩提学步不能一举足便大踏步前进,但一旦开始了学步,那大踏步前进也就必然是意中之事了。因为这儿学步的并非个人,而是集体;而且这个集体今后还将不断增加新生力量,扩大队伍,前途是无限的。”

进入90年代以来,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迎来了更加辉煌的时期。2000年1月,经学校批准,在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和专门史(经济史)学科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云南大学中国经

济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云南大学的中国经济史学科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80年,专门史(经济史)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1981年,该学科点在国家第一批学位授权点审批中,获硕士学位授权。1986年,又获博士学位授权。到目前为止,该学科点已招收培养硕士生六十多名,博士生四十余名。这不仅造就了一支云南大学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队伍,而且为其它高校和科研机构输送了一批经济史研究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史已发展成为云南大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并在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认为,这种发展离时代对我们的要求还很远。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证明,只有发展才能求得生存;只有发展,才无愧于时代。

面对新的世纪,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决定编撰出版一套《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编撰出版《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的目的在于,系统出版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学术水平,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在新的世纪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长期以来,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围绕唐宋经济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商品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经济地理、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及云南地方经济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形成了一定的特色。本丛书力求反映这一特色并有所拓展。为此,《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将每年从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成员和所培养的博士、硕士中选取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予以刊布。不论是专著抑或教材,

只要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均在选收范围。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是老一代学者种下的公孙树所结出的粒粒果实,寄托着老一代学者的期望。在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创建的前夕,曾有人劝李埏先生:“桃三李四,桃树三年就可以吃桃子。公孙树啊,公公栽了孙子才吃到白果。你这么大年纪,还能等吗?”虽然如此,李埏先生还是抱定爷爷栽树,孙子吃果的决心,向学校请缨,创建了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我们一定要继承老一辈的公孙精神,薪火相传,把《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作为一项长期的事业,不断地坚持和发展下去。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是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全体成员心智的凝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凝聚着每一位成员的劳动与耕耘,它是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在新世纪发展的历史写照。我们期望每一位学科成员发愤努力,大力支持和帮助,以期有更多更好的成果不断地奉献给社会。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是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展示学术成果,与学术界交流,服务社会,共同推进中国经济史学科繁荣和发展的一项举措。我们真诚地希望各界同行、各界朋友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在新的世纪更上一层楼。

丛书编委会

2000年11月



## 前 言

本书名为《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撰著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是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富民”阶层是在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长期以来，对于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学术界一直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阶层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我认为，“富民”阶层是重新解构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一把关键性钥匙，应花大力气开展对它的研究。本书试图在挖掘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富民”阶层置于唐宋以来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背景下，探讨唐代至清王朝这一历史阶段“富民”阶层的基本状况、“富民”阶层与基层控制、“富民”阶层与国家的关系、“富民”阶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透视这一阶层的成长壮大、社会活动，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二个目的，是探索如何开展研讨式教学。英国教育家阿什比说：“大学教育的试金石不是讲授伟大真理，而是用什么高明的方法来讲授伟大真理。所以，讲授什么不及如何讲授重要。”总结自己的学习经历，我深切地感受到，在我当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与我的谈话、讨论远比课堂教学对我的启发和影响要大得多。所以，在研究生教学改革中，我主张：理科，让课程走进实验室；文科，让课程走进研究室。基于此，自2004年起，我便组织云南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在站研究的博士后，以及对

## 2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

---

“富民”阶层问题有着浓厚兴趣的历史学基地班的本科生，就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开展专题式研讨，希望通过研讨，既能推进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的研究，又能真正启发学生的思维并将同学们导入一个新的前沿研究领域。

为做好这项工作，我确定了讨论的专题，并布置参与讨论的同学围绕这些专题去搜集和查阅资料，学习相关研究成果，撰写读书报告或读史札记，然后集中讨论。讨论之后，同学们再根据讨论中所得到的收获，撰写相关的研究论文。本书即是关于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讨教学成果的汇集。为清晰地反映我们的研讨情况和工作进展，本书上篇汇编了我们的专题讨论，下篇则汇集同学们根据讨论所撰写的论文。需要说明的是，上篇的各个专题，在本次编辑成书时，主要根据内容的逻辑联系加以编排，而没有完全遵照讨论的时间顺序；下篇则按历史时间加以编排。所有文稿完成后，由我逐篇作多次修改并最终编辑成书，同时撰写《“富民”阶层：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内部新兴的社会力量——再论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的意义》一文置于开篇，以进一步申论富民阶层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和“富民社会”的研究是近几年来我提出的一项新的研究课题。本课题提出后，学术界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与肯定。尤其是一批德高望重的前辈专家学者，有的认为这项研究是一项“创造性的研究”，有的说是一项“了不起的研究”，有的将其评价为一项“对今后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本研讨课的第一个讨论专题“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讨论完成后，《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在“研究生课程”栏目长篇刊发了我们讨论的内容。2006年，《历史教学》第10期在对我的专访中，又重点介绍了我对于“富民”阶层和“富民社会”的研究。2007年，《历史教学》第7期再次刊发了我的文章《关于“导读式”“研讨式”课程教学的认识》，这是我在组

织本专题研讨课中的一些体会与认识。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社科基金以及云南大学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的支持。所有这些肯定和支持，给予了我们莫大的激励。我们决心做好这项研究。我个人的研究计划是，通过从微观到宏观，再从宏观到微观，最后又从微观上升到宏观的研究过程，形成关于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研究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理论为理论基石，撰写具有自身特色和体系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本书是这个研究计划中产生的一项成果，与此前我们出版的《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一书可以说是姊妹篇，是我们对中国古代“富民”阶层进行微观考察和研究的继续与发展。虽然其中有些讨论和论文的内容、观点还不太成熟，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却反映着目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我们将其编辑出版，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批评与指教。在大家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为推进中国古代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作出我们的贡献。

林文勋

2007年7月

## 目 录

- “富民”阶层：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内部新兴的社会力量  
——再论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的意义 …… (1)

### 上 篇

- 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 …… (17)
- “富民”阶层与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经济、文化的发展 …… (39)
-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与基层控制 …… (75)
-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的士绅化 …… (98)
- 明清社会是否存在市民阶级？  
——兼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的转变 …… (128)

### 下 篇

- 试论中晚唐“富民”阶层的经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 (159)

## 2 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

---

### 宋代“富民”与国家的关系

- 从乡村组织及其头目分析说起 ..... (181)
- 宋代乡村治理中政府与“富民”的博弈关系分析 ..... (198)
- 宋朝“富民”与乡村慈善活动 ..... (224)
- 宋代“富民”的学缘网络
  - 从“子当读书”谈起 ..... (238)
- 宋代“富民”的道德形象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 (262)
- 明初迁徙“富民”与京师“富户” ..... (298)
- 明代江南“富民”阶层流动初探 ..... (318)
- 试论明代“富民”阶层的士绅化 ..... (336)
- 清代社仓运行中的官民博弈
  - 中央集权下的“富民”与国家关系 ..... (357)
- 明清时期的“善人” ..... (381)
- 明清“保富论”述略 ..... (391)
- “富民”还是“市民”：明清社会依然是“富民社会”  
..... (423)
- 明清“富民社会”的近代性倾向 ..... (438)

## “富民”阶层：唐宋以来中国社会 内部新兴的社会力量

——再论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的意义

明清之际，顾炎武在总结汉唐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时说道：“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sup>①</sup>从“豪民”、“兼并之徒”到“田主”，虽然仅有几个字的差别，但却包含着汉宋之间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实际上，从“豪民”、“兼并之徒”到“田主”的变化过程，就是从“豪民”到“富民”的变化过程。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的崛起。

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一开始就有着与其他社会阶层不同的显著特征。据《北梦琐言》卷3《不肖子三变》记

---

<sup>①</sup> 顾炎武：《日知录》卷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载：“唐咸通中，荆州有书生号唐五经者，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辈，以束脩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僚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虫，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这里，虽然说“三食之辈，何代无之”，但它却为唐宋人所总结，无疑更真实地反映了唐宋社会的情况。我认为，这既总结出了唐宋社会富民家庭衰败的三部曲，又道出了富民家庭的根基与特征。作为富民家庭，维持其家业不败，一是靠财富，二是靠文化教育。也就是说，占有财富并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是富民阶层的显著特征。

元代，蒙元入主中原，社会呈现诸多新的特征，但富民阶层的特征却一仍其旧。如浙江金溪吴氏，据吴澄所撰《金溪吴氏族谱序》：“其族赀产盛，文儒盛，宋之季以科名显者相踵，而宋亡矣，诗书礼义之习逮今，犹前日其盛未替也。”<sup>①</sup>又如义乌楼氏，据方孝孺所撰《楼君墓铭》：“君讳士祥，字彦璋，氏曰楼，所居邑曰义乌。祖讳所绍，父如浚，字文翁，文翁童儿少，丰厚有志略，绍无子，遂招而子之，曰：‘是儿必大吾家。’文翁既长，理财殖产，具有方画，日充月拓，卒为巨室。当婺之富民称楼氏，宾客食其庭者数十人，子弟厮役皆衣绮绣，善骑马臂鹰走狗驰逐为乐。君独弗效其所为，衣帛裘不臻华靡，事亲遇，人诚谨笃实，曾不知其为富人。贤士君子以是称之，遣长子从名儒太史公学教，诸子事树艺，有余以嫖困者，岁时击牲为酒，召所亲厚故人会饮，笑歌为乐。见之者曰：此承平时富民也。年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终。是年某月某日葬石桥山。”<sup>②</sup>

<sup>①</sup> 吴澄：《吴文正集》卷32，《金溪吴氏族谱序》。

<sup>②</sup>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2，《楼君墓铭》。

这说明，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富民阶层的历史特征是极为稳定的。

明代，富民阶层继续以财富和文化教育雄居于社会。明人杨士奇曾说：“吾宗自吉水徙西昌盖四百年，世以贵甲间右，然所恃者，诗书行义相传袭，未尝恃贵也。”<sup>①</sup> 翻检明清两代关于富民的记载，无不透露着这样的历史信息。直到近代，富民的历史特征仍然鲜明地表现出来。2006年8月，笔者前往浙江南浔镇。南浔为浙江湖州古镇，明清以来，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这里出现了一批财力和声誉显赫的富民。民间将这批富民称之为“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四象”指刘、张、庞、顾四家，言其为“象”，指其财力当在百万两以上，有的甚至在千万两以上；“八牛”指邢、周、邱、陈、金、张、梅、蒋八家，言其为“牛”，指其财力当在五十万两至百万两之间；而被称为“金黄狗”的七十二家，估计其财力应在一二十万两。在这里，笔者考察了财力名居榜首的几位富民家庭的旧宅和闻名已久的嘉业堂藏书楼，既为这些富民的财力所惊异，更为其深厚的文化根基所感叹。这些富民家庭，虽都以财富雄于江南，但无不以诗书礼义持家。只要是财力颇丰的富民之家，无不设有读书、藏书之所，都以教导子孙读书为治家之本。其中，在享有“四象”之称的富民张氏旧宅，在其抱柱之上，我们看到了翁同龢的题联：“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2007年8月，笔者前往河南，考察了闻名于中原大地的康百万庄园。该庄园位于嵩、邙、河、洛交汇之地，其祖先在元末明初由山西洪洞迁往河南。这个家庭在明代逐渐发展起来，至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几朝进入全盛，其田地、生意遍布国内许多省区，同治、光绪以后逐步走向衰落，但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近代，是中原地区

<sup>①</sup>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5，《乐志堂记》。



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富民家庭。走进庄园，其墙壁和厅堂门柱上仍保存有清代以来当地官府和乡民题写的诸如“良田千顷”、“博学仁风”、“德懋行芳”、“义稠仁里”、“谊重桑梓”、“功垂桑梓”、“德泽齐鲁”、“景仰公平”、“受人以惠”、“轻财义举”的匾额，其厅堂门柱上的题联写道：“志欲光前惟是读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这再一次使笔者对富民的历史特征有了直观的感受与领悟。

## 二

作为一个与其他社会群体有着显著不同特征的新兴社会群体，富民阶层从一开始产生就在社会上具有非同一般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影响。早在中唐，富民的影响已备受时人关注。《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全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士名僚，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又据唐人李冗的《独异志》记载：“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上，问左右，曰：‘不见。’急召元宝，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于状。左右贵人启曰：‘何臣等不见，元宝独见之也？’帝曰：‘我闻至富敌至贵。朕，天下之主；元宝，天下之富，故耳。’”这段史料中提到的“元宝”，就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天下富商王元宝。同书记其财富之多说：“唐富人王元宝，玄宗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时人谓钱为王者，以有元宝字也。”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史料中提到的“至富敌至贵”。我曾经分析指出，“至富敌至贵”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力量的作用已显著增强，成为与政治力量同等重要的一股社会力量，共同规定着唐宋以来中国社会